

超越「尺度」的方法 ——「皇民文學」與坂口禊子的 〈杜秋泉〉、〈鄭一家〉

武久康高

日本比治山大學言語文化學科副教授

吳佩珍 譯

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

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存在著判斷優劣的「尺度」，某些台灣人透過與尺度同化而獲得日本人樣式的觀點。所謂台灣人的「皇民文學」是從「血」的觀點而得知自己「並非日本人」，而希望能透過成為「志願兵」流血一途進而成為日本人的故事。

另一方面，對被評為「不以統治民族的眼光來看本島人以及『蕃地』」的坂口禊子而言，在〈杜秋泉〉中認定這樣的「尺度」是「自己耗弱的神經」所製造的產物。然而，認為「自我決定」就能夠超脫「尺度」的立場不僅使以「血統」差異為殖民地統治基礎的實態的能見度消失，也強化了為「維持人種歧視的壓榨體系」論述。不過〈鄭一家〉中所主張的，「尺度」是在「寬大的八紘一宇精神」下，讓「無論任何東西都能迅速消化並將其日本化」的日本吞噬台灣

文化，消滅二者（日本人與台灣人）的區隔。（換言之，便是「尺度」是能夠超越的）。然而，這不過是另一個強化補全「血的支配」這個更具象徵意味的統治基礎論述。也就是說，坂口的作品中「尺度」的超越方法可說是具有維持殖民地統治體制論述的機能。

關鍵字：尺度、坂口禰子、皇民文學、八紘一宇、興亞

Overcoming “the Measure”: The Imperial Subject Literature and Sakaguchi Reiko’s “To shusen” and “the Te Family”

Takehisa Yasutaka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 Hijiyam niversity

Abstract

“The measure” judging the values from superiority to inferiority existed in colonial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ing. Some Taiwanese gained the gaze of Japanese style through incorporating into this measure. The Imperial subject literature written by Taiwanese reminded them that “we are not Japanese” through the sense of blood. The imperial subject literature is the narrative about how they decided to become volunteer soldier to shed the blood for becoming Japanese.

On the other hand, Sakaguchi Reiko, who was praised as “not gazing the islanders and the aborigines with the imperial eyes,” asserted that “the measure” was made by the fragile nerves of Taiwanese themselves in her “To Shusen”. Sakaguchi pointed out that “the measure” can be overcome by self-determination, however, this universal position not only made the reality of colonial rule based on the blood discourse invisible, but reinforced the discourse maintaining the exploited system of racial-discrimination. Besides, in “the Te Family”, “the measure” was based under “the spirits of the whole world under one roof.” Digesting and Japanizing everything with vitality, it not only made Japan swallow Taiwanese culture, but eras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It too reinforced the ruling discourse based on the blood with symbolic meaning. We can see how all the ways of overcoming “the measure” in

Sakaguchi's works function as the endorsement of maintaining the system of colonial ruling.

Key words: "the measure", Sakaguchi Reilko, the imperial subject literature, the blood

超越「尺度」的方法

——「皇民文學」與坂口禰子的〈杜秋泉〉、〈鄭一家〉

一、「尺度」與「皇民文學」

(一) 周金波〈「尺度」的誕生〉

周金波長期以來被稱為「皇民作家」，近年來從「對台灣文化執著」的¹觀點重新再被評價。他於一九四二年一月發表於《文藝台灣》的〈「尺度」的誕生〉和之前受到好評的〈志願兵〉形成對照，當時似乎「並未受到太高的評價」²。但是本作品描寫日本統治下台灣所存在的「尺度」，讓小孩子渴望被他者視為日本人的心理糾葛，也就是台灣人如何將以皇民化政策為基礎的「尺度」內面化的過程為主題。此外，如同「這個少年的日本人樣式的視點，隨著成長進而巨化登場的是《水癌》主人公的牙醫」³的見解，在考量作家周金波作品主人公形象的系譜時，也可說是極為重要的作品。接下來將解說較少受到矚目的本作品，同時整理概要。

舞臺是「滿州事變結束，上海事變之後」的台灣。「隨著戰爭而日益激化的國家意識將平常的嫌隙完全吞沒」，即使在「以小河為界、小學校與公學校比鄰而居」的此處，透過「小學校兒童之後緊跟著公學校的兒童隊伍」，對「同一神

¹ 星名宏修，〈《氣候と信仰と持病》論〉，下村作次郎、中島利郎、藤井省三、黃英哲編，《よみがえる台湾文学—日本統治期の作家と作品—》（東方書店，1995年10月），頁448。

² 鼎談（西川滿發言『文芸台灣』4-3）。本文引自中島利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編，《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文芸評論集》第四卷（綠蔭書房，2001年4月），頁139。

³ 中島利郎，〈編者あとがき〉，《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文芸評論集》第四卷，頁380。

祇「同樣祈禱」的行為，「忽然對鄰近的小學校兒童產生了親近之情」。換言之，透過與「日本人相同」的神社參拜行動，雖然公學校兒童對「小學校兒童產生了親近之情」，但是如同「小學校兒童之後緊跟著公學校的兒童隊伍」所呈現的，日本人為基礎的日本統治下台灣的序列在此清楚地浮上檯面。此作品之後就以主人公——公學校五年級生吳文雄希望被視作日本人，被認同為日本人的意識動搖為中心進行描寫。

公學校五年級生的吳文雄帶領著同級生「白猴」、「痰盂」、「油」，今天依舊玩著戰爭遊戲。但是吳文雄所想像的「皇軍進擊圖」進行的並不順利，同時另一方面卻認為小學校戰爭遊戲「是比較精彩的」。

在上課中，熱中塗鴉「皇軍進擊圖」的吳文雄，因此被老師訓斥，被點名時稱他為「Fumio」。雖然這是為了與同班同學的吳文佑「Go Bunyu」做區分，私底下非常希望能夠使用「Kure Fumio」這個名字的吳文雄，此時「通體輕飄飄，全身的血液似乎開始倒流」。而當下他馬上送出「今天下課回家途中，一起去看軍艦」，署名「Fumio」的字條給「白猴」、「痰盂」、「油」。

下課後，他故意對他們「裝迷糊」，對公學校的同學們說道：「石井老師不知為什麼叫我 Fumio 呢」，但得到的答案卻是「因為有兩個 Go Bunyu 嘛」，讓自己的期待落空。希望得到同學們的認同以強化「被認同為日本人的自己」的自我形象，然而卻事與願違。因此吳文雄心想「真是遲鈍的傢伙，不理他們了」，「畢竟只有自己被叫作 Fumio，和這些人還是不一樣」，而「深感自豪」。

之後吳文雄慣常地在意他者的眼光⁴。例如下課後與士官相遇，自己與他「牽著手一起走」，期待從海軍士官臉上讀出「自己是士官的弟弟，或是親戚的孩子」的訊息。也就是希望被士官認同「與日本人一樣」，但「一想到萬一有小學校的學生經過，頓時他愉快的幻想便煙飛雲散了」。這是因為擔心「如果來了小學校的真正日本兒童或許會被看出自己不是日本人」⁵。之後士官讓公學校的孩童開始比賽起相撲，但由於他們不知道技巧與規則所以無疾而終，也讓「為看熱鬧

⁴ フェイ・阮・クリーマン，《大日本帝国のクレオール〈植民地期台湾の日本語文学〉》（慶応義塾大学出版會，2007年11月），頁248。

⁵ 同上註，頁247。

而聚集的群眾」敗興而歸，但從另一端卻傳來小學校學童相撲的歡呼聲。在此間，吳文雄覺得「真是太丟人了，心中暗自祈禱著：能不能快快停止呢？」，相撲結束後，「察覺了背後無聲的嘲笑以及如針刺般的漠視，宛如被追趕般地」跳入海中。也就是說，吳文雄內部的「日本＝優勢／台灣＝劣勢」尺度將「是否與日本人一樣被一視同仁」的他者視線內面化，也由於這個視線的存在而有了劣等感。

之後，吳文雄被父親問到是否希望轉到小學校時，「至今為止未曾有的喜悅」以及幻想湧上心頭。但同時不安，憂慮以及「對公學校的執著與鄉愁」也重重地壓在吳文雄身上。乍看之下似乎令人覺得唐突，但此處「對公學校的執著與鄉愁」的描寫才是之後被認為在〈氣候、信仰與痼疾〉或〈鄉愁〉當中所看到周金波「對台灣文化的執著」以及「愛鄉土·愛台灣」的另外一面。而之後的故事，吳文雄和小學校的學生對台灣女人齊聲罵道：「臭婆婆」，另一方面則看著公學校的同學們玩著戰爭遊戲而感到「被許多冷冷的眼睛所包圍」。對於自己到昨天為止還得意地揮著指揮刀感到羞恥。

之後的吳文雄，對於擅長在公學校當老大一事變得膽怯起來，對隔牆小學校的戰爭遊戲，也養成了小心翼翼只在遠方觀望的習慣。

從以上的概要便能清楚得知本篇作品題名的中所指的「尺度」到底是什麼。指的也就是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日本人」的行為舉止以及樣式成為所謂優位的價值基準。主人公吳文雄在這個「尺度」下，希望自己被他者視為「日本人」。然而另一方面卻也感到不安、擔心以及「對公學校的執著與鄉愁」，但是最終還是選擇遵從「尺度」的人生。此外，中島利郎也指出「這個少年的日本人樣式的觀點隨著成長而巨化，進而登場的是《水癌》的主人公牙醫師」，而這樣的主人公形象的系譜便是周金波為何會被稱為「皇民作家」的理由。而另一方面，從本作品的主人公被描寫為難以割捨「對公學校的執著與鄉愁」這點來看，可看出之後〈氣候、信仰與痼疾〉或〈鄉愁〉當中所看到周金波「對台灣文化的執著」以及「愛鄉土·愛台灣」⁶的另外一面。

⁶ 中島利郎，〈編者あとがき〉，頁304。

然而中島利郎對本作品題名不是〈尺度的誕生〉而是〈「尺度」的誕生〉抱持疑問，並在周金波生前請教他，周金波當場似乎答道「是我的諷刺」。⁷關於這一點，中島解釋為：「周氏想說的不是『我的諷刺』而是『對我的諷刺』也就是『對自己的挖苦』」。因此，與周金波少年時期或許重疊的主人公吳文雄轉變成為日本人樣式視點，他指出「彷彿眺望著自己往昔的背影，『回歸』的作家周金波抱著感慨與些許的反省，描寫不自覺當中的所作所為」⁸。也就是說，這個作品諷刺往昔的自己以及台灣的孩子們在無意識中同化於日本的「尺度」，包括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

（二）周金波〈水癌〉

在〈「尺度」的誕生〉中，無論中島對周金波所謂的「諷刺」能夠解讀到何種程度，在此想再度確認的是「這個少年的日本人樣式的觀點隨著成長進而巨化登場的是《水癌》的主人公牙醫師」一點。

〈水癌〉的主人公是有東京留學經驗的牙醫師。回國之後，將家中鋪上榻榻米，興奮地「展開像日本人的生活」。此外，自己的孩子們對於榻榻米的生活「感覺很光榮」而心情愉悅。這樣的他認為「站在指導階級立場」的自己必須教化島民，並且排除台灣的「迷信」與「陋習」。本作品的梗概是他這樣的使命感因某個事件（「庶民階級」的「無教養而驕奢的女性」為了自己的賭博以及玩樂費用，枉顧罹患了「水癌」的女兒）而更加強烈。

這就是現在的台灣。但是就是因為如此，也就是因為如此所以不能輸。
那女人身上所流的血，也是流在我體內的血。不能坐視不管，也必須淨化我的血。我並不只是個醫生，也必須成為我族類的心理醫師。怎麼能夠輸呢……。

⁷ 中島利郎，〈編者あとがき〉，頁 307-308。

⁸ 同上註，頁 308。

這是〈水癌〉結尾的部份。在此，他一方面提到自己所流著「同一族類」的血，同時發誓要淨化自己的血，也就是以「同一族類醫生」的身分，將落後的「迷信」與「陋習」去除。這裡我們所能夠理解的構圖便是，在前述的「尺度」之下，已將彼此「尺度」同化的自己將負起教化劣等台灣的責任。

(三)「尺度」與「皇民文學」

然而，對於周金波這一系列的小說，星名宏修則指出：「能夠當成一種摸索成為「日本人」／「皇民」「方法論」的作品群來閱讀」，更進一步地指出在周金波及陳火泉的「皇民文學」當中，「他們的『血』被描寫成為應該被否定」，「為了成為『皇民』，他們要求『轉換他們的血液』，志願成為『志願兵』被當成模範的解決方式」⁹。換言之，我們是能夠理解的。在這樣的「皇民文學」當中出現的人物（周金波〈志願兵〉中的高進六與張明貴，陳火泉〈道〉中的主人公等）雖然企圖與上述的「尺度」同化，然後將自己的自我認同與日本人重疊，但最後從「血」的觀點得知自己「並非日本人」，所以希望能透過成為志願兵流血的解決之道以成為「日本人」／「皇民」。由這點來看，所謂的「皇民文學」可說是在殖民地台灣下同化於「尺度」的台灣人在面對以下的問題時所描寫的小說。

接下來，一方面將就以「尺度」為主題的「皇民文學」樣式列入考量，本稿將就日本人作家坂口禊子作品中台灣知識份子與「尺度」的關連進行討論。由於坂口被評為「活躍於日本殖民地時期地台灣的「特別」的日本作家」，而其理由之一如下。¹⁰

在殖民地台灣，她並沒有先入為主的主觀，有著純粹觀察事物的目光。

換言之，在創作時，無論是以內地人、本島人、「蕃地」人為題材，總是

⁹ 星名宏修，〈『血液』の政治学—台湾『皇民化期文学』を読む—〉，《日本東洋文化論集》no.7（琉球大学法文学部，2001年3月），頁40-41。

¹⁰ 中島利郎，〈坂口禊子作品解説〉，《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 日本人作家作品集》第5卷（東京：綠蔭書房，1998年7月），頁557。

與自己保持同樣的間距，並不以統治民族的眼光來看待本島人或「蕃地」人。這樣的視點並不是她在作品描寫上刻意使用的技巧，而可說是從幼小時期已經養成的日常生活的習性。在日本殖民地時期台灣的短暫創作活動中，她的作品不僅是日本人讀者以及作家，連台灣人也讚賞的原因就在與此。

這裡我們所要注意的是「不以統治民族的眼光來看待本島人或『蕃地』人」這一點¹¹，而坂口對於存在於殖民地時期台灣的「尺度」與台灣人的關係是如何表現的呢？，此外，她是如何將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的懸殊差異描繪成能夠超越的呢？接下來，我們將進入討論。

二、坂口禰子〈杜秋泉〉

坂口禰子初期的作品當中有以台灣人醫師為主人公的小說〈杜秋泉〉（《台灣新聞》1940年9月21日）。本作品以接近台灣人知識份子的視點，描寫主人公與本島人以及內地人接觸時所呈現的精神狀態。

由內地的 K 醫專畢業之後在 E 街開業的杜秋泉，或許也因為看著當天最初的病人臨終，在喪失自信的情況之下，返回也是兼自宅的醫院。在此處，我們先來看看杜秋泉與車夫之間的對話。

「陳許仁大人，死了嗎」

車夫對自己的說話聲，讓秋泉吃了一驚，睜開眼睛一看，四周是明亮的秋陽。

「嗯」，點了點頭，秋泉邊看著似乎在車夫的背上與手腕滾動的汗珠，下定決心不再想著已經死去的病患。接著便問因患了麻疹而讓自己診斷過

¹¹ 關於這一點，星名宏修提出疑問：「但是坂口真的『以同樣的間距』看待內地人與『蕃地』人嗎？而在戰爭時期的殖民地，所謂『無先入為主的主觀，純粹觀察事物的目光』是怎麼樣的凝視呢？」，從坂口的作品以及當時論述空間中「優性思想」以及「血液」的分析來看，迫切地認為重新評價上述論點的需要。詳見星名宏修，〈『血液』の政治学—台湾『皇民化期文学』を讀む—〉，《日本東洋文化論集》no.7（琉球大学法文学部，2001年3月），頁17-18。

的孩子：「你家玉英怎麼樣了？」

「啊，已經可以一起吃飯了」。

「那太好了」。

一想到與自己的長女芳壽都是五歲的玉英，可能在不太衛生的家中，在只有鋪著一張草蓆下輾轉的慘澹，便心痛了起來。

或是「同一族群」的杜秋泉以及車夫之間，實際上以何種語言對話，並無法確認，但是二者之間日語表記（流暢與否）被設定為有著差異，如果將——從杜秋泉的視點來描寫車夫的孩子們所處的「令人心痛」的境遇，以及本島人部落不衛生的狀況，另一方面，文本當中杜秋泉與也許是「同一族群」的妻子之間的對話，雙方都以流暢的日語表記¹²——列入考量，「日語」在本作品成為表現階層以及文化程度的指標，可看出杜秋泉們被形塑為能流利地使用「日語」，與其他本島人有所區分的存在。（也就是與「水癌」的醫師同樣都是「指導階級」）。

之後，「心中籠罩著看不到本島人衛生生活出路的陰霾」，回到家中的杜秋泉，醫院已有大批的患者正等著他。但是，年輕的妻子身上所穿的淡桃紅色衣服似乎解救了的杜秋泉，透過與回到醫院後最初所診療的年輕內地人的男性患者之間的對話，「心中頓時輕快了起來」。但是接著診療因病況嚴重，緊急來院的本島人患者們，他的神經再度受到重重的壓迫進而痛苦不堪。

在「精神狀態方面因承受著激烈震盪交錯而終於瀕臨崩潰」的這時候，來了內地人女性的急病患者。

秋泉至今為止診療過許多女性病患，大都是輕微感冒或是胃腸不適，並沒有大礙。內地人的家庭，只要稍微發燒，或者肚子疼痛，為了慎重起

¹² 杜秋泉與妻子之間的對話如下：

「どんなでしたの」／「うん。やつぱり駄目だつたよ然し、もう老齡だからなあ」と最後は自分へ言ひ聞かせるやうな返事をする、やはりあれはあれでよかつたのだと次第に落着いてくるのであつた。／「患者さんが沢山待つてゐますよ」／「うん。今行く」自分の内部にこんなに迄作用する妻であつたのかと、しみじみとした温かさを感じながら、優しい言葉をかけてやりたいと言ふやうな思ひになつてゐる自分に、やはりこれは未だ自分はさつきからの感傷に囚はれてゐるのである、と思ひ返すのであつた。」

見都會尋求醫生的協助。這樣的習慣，跟患了重病卻放任不管直到死期將近的本島人患者比起來，不自覺地會讓人覺得患者的身體多麼纖細脆弱。

和本島人比起來讓人覺得非常纖細脆弱的內地人的身體。對於內地人肉體的認識在他內部建漸漸地膨脹，終於有了「肉體的一部分竟是如此地白，似乎是超乎了人類的某種東西般的錯覺」，心中的震動也出現在指尖。換言之，杜秋泉在面對著內地人婦人的肉體時，不但喚起了過去診療內地女性的記憶，同時「內地人＝優位／本島人＝劣位」的觀念也逐漸膨脹。結果，本島人自己本身似乎就將被那觀念所壓垮。

但是杜秋泉，之後在婦人的丈夫平常的一句話：「到底是哪裡不好呢？」，而回復了鎮定，在下列這段文章當中，結束了故事。

不管內地人或是本島人，結果都是自己衰弱的神經所製造出來的尺度的差異，這麼一定下神來回復鎮定，他於是便冷靜地用注射筒吸入了注射針液。

將判定內地人與本島人之間優劣的「尺度」看成是「自己衰弱的神經所製造出來的」，並打算對二者之間的差異並不區隔平等以對。這樣的態度與先前引文當中〈水癌〉的醫師——一面論及自己也流著「同一族群」的血液，一方面誓言要清淨自己的血液，也就是以「同族的醫師」身分奮力破除台灣後進的「迷信」與「陋習」。此處明顯地意識到台灣與日本二者的優劣，可看出醫師所深具的「模範」性質。進而讓人想起先前中島利郎對於坂口的評價：「在創作時，無論是以內地人、本島人、「蕃地」人為題材，總是與自己保持同樣的間距，並不以統治民族的眼光來看待本島人或「蕃地」人」。

但在此處應需留意的是將日本人置於優位的這把「尺度」是由社會性與文化性所建構的，而要超越這把「尺度」是非常困難的事。在上一節當中所確認的所謂台灣人的「皇民文學」是誠摯地對完成同化於這把由社會性與文化性所建構的「尺度」後，台灣人如何能與「日本人」一樣（也就是如何超越「尺度」）的問題提出質問。根據前述星名宏修的主張，因此他們（台灣人）企圖「以血

換血」來解決。但是另一方面，在〈杜秋泉〉中坂口則提出的是精神樣式的方法。タカシ・フジタニ指出「關於日本本土與朝鮮的殖民地關係在戰爭後半期的論述」中，完整地補強「經常被明確主張的血緣第一主義」是「某種完全否認血的象徵主義的人道主義以及普遍主義，以及『國民歸屬只不過是一種選擇性問題』的主張」，同時認為「這樣的國家主義並不是出於每個個人，而是基於僅僅透過他們的自我決定就能夠獲的真正的國民主體的思想」¹³。將タカシ・フジタニ主張對照此處來看的話，坂口的透過「自我決定」便能超越「尺度」的普遍主義立場也反而讓基於「血」的差異進行統治的殖民地支配實態的能見度消失，也可說是為了支持「人種歧視的壓榨體制」¹⁴論述。而〈杜秋泉〉中簡化的結論卻使得「皇民文學」中所指出的在殖民地統治下種種差別待遇問題反而消失不見。

而坂口也還有與當時統治民族所編織的論述相關的其他作品。下一節將就與杜秋泉同樣有著內地留學經驗的台灣人醫師〈鄭一家〉許茂仁的形象刻畫進行討論。

三、坂口禰子〈鄭一家〉

〈鄭一家〉的許茂仁有日本留學的經驗，現今是在 E 街上開業的醫師。引文的部份是許茂仁為了建議鄭朝的喪禮應採用台灣形式而拜訪鄭朝的兒子樹虹。

「我不是來向你抗議的，你要把你父親帶到台北的時候，聽說你認為這邊的醫生是不行的。不，絕對不是責備你。我想你會這麼說，應該是你自己的想法，我身為一個醫生，覺得非常遺憾，雖然覺得這麼說是很失禮的。

¹³ タカシ・フジタニ，〈植民地支配後期の「朝鮮」映画における国民、血、自決／民族自決—今井正監督作品の分析—〉，富山一郎編，《歴史の描き方3 記憶が語り始める》（東京大学出版會，2006年12月），頁52。

¹⁴ タカシ・フジタニ，〈植民地支配後期の「朝鮮」映画における国民、血、自決／民族自決—今井正監督作品の分析—〉，頁52。

新一代不相信我們本島人醫生的診斷。如果症狀輕，那就讓我們診療。一看之下，什麼？我們自己也清楚的病症嘛，不需要看醫生。但如果稍微一惡化，便說不來了。到市區的醫院去了。我們也束手無策只好放棄。而我好不容易最近有了自己無論是什麼病也能診斷的自信，所以也不願意自己的病人到外面去。從前反而是唯恐避之不及的。」

「有這麼複雜嗎？許先生，那是在你的內部住著內地人的亡靈，而那深深地傷害了你的神經。或許是因為我從中學開始便在內地，我並沒有所謂根深蒂固的內地人觀念。」

「不過你的太太也是內地人」

「不，正好相反。我對於本島人或是內地人並沒有區隔感，也因為如此才能與小夜結婚。」

「我明白。我在內地留學的歲月當中並沒有像你所說的，為亡靈所苦。不過一旦回到這裡來開業，就沒有辦法了。不過，鄭先生，是不是能夠這麼說呢，內地人對於我們的技術並沒有完全信任，而這樣的事實反射到了我們身上，而我們也畏懼著這所被反照的陰影，而沒有替他們把脈的自信。」

「是的，完全如你所說的。因為是一種相互依賴的關係。也可說是不相信的人便無法得救。這樣一來，醫學應該不能完全說是完全的科學吧。而是帶有宗教色彩的。」

「耶穌基督慰問病人也能夠說是這樣的心理因素吧。」

沒有診療內地人患者自信的許茂仁。對此，樹虹認為那是因為許的內部「住著內地人的亡靈，而那深深地傷害了你的神經」，而另一方面卻說自己「並沒有所謂根深蒂固的內地人觀念」，「對於本島人或是內地人並沒有區隔感」。當然在此，許為「內地人的亡靈」「削弱了神經」的樣子，可說是與為「尺度」所苦的杜秋泉或者是吳文雄的形象是重疊的。此外從此處引文可得知因為「內地人亡靈」的關係使得本島人與內地人之間有著「區隔感」的存在，同時「內地人對於我們的技術並不完全信任，而這樣的事實反射到了我們身上」，「而我們也畏

懼著這反照的陰影」，杜秋泉以及吳文雄所感到「尺度」壓迫的原因正可說是這個「反照的陰影」，也就是內面化的他者的視線（將台灣人視為劣位的內地人視線）的存在吧。

這樣看來，認為「對於本島人或是內地人並沒有區隔感」的樹虹與畏懼內面化的內地人視線的許茂仁之間似乎有著間隙，但是為了彌補這樣的間隙需要什麼樣的論述呢？接下來所引用的，是鄭朝台灣式的葬禮結束之後，孫兒樹一郎與父親樹虹以及繼母翠霞一起搭火車的場面。

「我和許先生見過面了。」

「許先生？這樣啊。他說了什麼？他也對我說了許多。」

「內地人不要陶醉在自己指導立場的優越感，不要傲慢，應該下降到等同的高度，伸手提拔往上提升到自己至今為止所在的高度。他是這麼說的。」「最近年輕人難道不是這麼想的嗎？」

「是的。因為同伴們都為了大規模的戰爭在打仗。為了小事情錙銖必較可是做不成興亞這樣的大事業呢。」

「是的。已經不是以狹小的見地行動的時代了。從這點說來，父親對於祖父的葬禮是要採日本式，還是台灣式這樣的想法或許是無關緊要的。即使從擁有三千年的歷史日本的整體來看，從南到北並不是擁有相同習俗，所以就讓台灣擁有台灣的習俗又何妨呢？此外，將這樣的地方日本化，正可看出寬大的八紘一宇的精神。」

「爸爸我好像覺得自己輸了，不過，令人意外的似乎沒有輸。那樣也好。那樣也好。」

「我知道您的心情，爸爸。日本人是個無論是什麼東西都要立即消化，將其日本化的人種。支那的文化也好歐洲的文明也好，全部當成自己的東西，全部吞到肚子裡，但臉上卻顯出自己的肚子裡是沒有異物的表情。這並不是有氣度，而只是容量大而已。把其他地方的東西只當成養份吸收，自己本身卻能保持純粹一點也沒變，是個可怕的人種。有著旺盛的精神力。我們看來，是覺得非常值得依賴的。而我也是其中的一員。」

「我這次回到這裡之後，似乎感覺好像被向後拉著倒退，但其實是前進的。由於是非常劇烈的運動，衝擊力太強了，所以讓我有著被往後拉著倒退的感覺。」

為「內地人亡靈」所苦的許茂仁，他的想法不是像〈水癌〉中的主人公般，身為「指導階級」的自己必須提昇落後的本島人，而是內地人也必須下降到等同本島人的高度將本島人往上提拔。或許透過這樣的作法便能逃離「將台灣人視為劣等的內地人視線」，進而消滅「本島人或是內地人間明顯的區隔感」。

許的想法是「最近年輕人的思維」，在「同伴們為了大規模的戰爭目前都在戰鬥」的現今，被樹一郎定位為與「興亞大業」攸關的位置。此處的理論是即使是「擁有三千年歷史的日本全體」，從「南端到北端並非擁有相同的習俗稱」而所謂讓「台灣擁有台灣的習俗」，首先在於承認台灣文化的主體性，但是結果仍然是被擁有「無論是什麼東西都立即消化將其日本化」的「強韌精神力量」的日本所吞噬，二者（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的「區隔」消失，反之這也就是日本人提攜台灣人讓其向上提升有著連結關係，而此處所指的也就是在「寬大的八紘一字精神」下，台灣被日本化的論述。

遵循上述的理論，讓吳文雄以及杜秋泉受折磨的「尺度」以及許茂仁所抱持的「本島人或是內地人的明顯的區隔感」恐怕都能夠冰釋吧。即使本島人順從「落後」的台灣風俗，那都將在「寬大的八紘一字精神」之下完全被吞噬，成為日本的東西。換言之，那樣的行為被日本化之後，二者之間「明顯的區別」就會消失。當然另一方面來說，也能將「落後」的本島人提升到與內地人同等的地位吧。也就是說，坂口的小說在這種「興亞」以及「八紘一字」的論述之下，以「日本＝優位／台灣＝劣位」的序列為基礎的「尺度」被認為是能夠被超越的。

而〈鄭一家〉的修辭補強了殖民地時期「血」的相關論述。如同許多先行研究者都已經提出的¹⁵，陳紹馨在〈小說《陳夫人》第二部中出現的血的問題〉當中，提出「但是，血真的是無法超越的宿命的障礙嗎？」的疑問，並做出「所

¹⁵ 星名宏修，〈『血液』の政治学—台湾『皇民化期文学』を読む—〉，頁41-42。

謂血的差異，大部分只不過是在不同的命運共同體中，其文化以及歷史形象的明顯地且象徵性的不同的表現」，而「那非得是文化的，歷史的努力以及創造的世界不可」。他並且提到「只要成為命運共同體」，「從來狹隘的血統障礙便會消失，之後則會出現更廣大且象徵性的『血的支配』」¹⁶。而此處所產生的問題，陳紹馨則認為是「如何完全融入廣大的命運共同體」。此處陳紹馨所主張的所謂超越內地人與本島人差異性的「融入更廣大的命運共同體」，就〈鄭一家〉來說便相當於在「興亞」以及「八紘一宇」的論述下，台灣為日本完全吞噬，而這樣的經過過程，便「出現更廣大且象徵性的『血的支配』」。也就是說在此處已經檢視的〈鄭一家〉中尺度的超越方法，同時也是補強更具象徵意義的以「血的支配」為基礎的論述。在這層意義上，本作品可說是具有維持殖民地統治體制修辭機能的可能性。

四、結語

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度量優劣的「尺度」是存在的，同時有些台灣人與其同化而獲得日本人形式的視點。而由台灣人所創作的「皇民文學」，星名指出，是透過「血」的觀點得知「自己並非日本人」的台灣人們決定成為「志願兵」流血以便能夠成為「日本人」的故事。

另一方面，被評價為「不以統治民族的眼光來看待本島人或「蕃地」人」的日本人作家坂口禊子在〈杜秋泉〉當中則將這個「尺度」當作是出自「自己耗弱神經」的產物。而透過「自我決定」便能超越「尺度」的坂口的立場，不但讓基於「血」的差異進行統治的殖民地支配實態的能見度消失，也補強了支持「人種歧視的榨取體制」的論述。〈鄭一家〉當中則主張，其「尺度」是在「廣大的八紘一宇的精神」下，台灣文化為有著「無論是什麼東西都立即消化並將其日本化」的「強韌精神力量」的日本所吞噬，二者（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

¹⁶ 陳紹馨，〈小說『陳夫人』第二部にあらわれた血の問題〉，《台灣時報》276號（1942年12月）。引用文引自中島利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文芸評論集》第四卷，頁305-306。

的「區隔」消失（也就是超越了「尺度」）。換言之，就是坂口的作品當中所呈現的「尺度」超越的方法都可說是有著維持殖民地統治體制論述的機能。

然而楊達對於〈鄭一家〉的解讀，則認為鄭家三代都有著「奴隸性格」，對日本人而言則是方便與皇民化運動做連結¹⁷。如楊達這般對坂口維持殖民地統治體制機能的論述加以抨擊的主張應是存在的。因此今後將對照當時的論述情況，對於其他作家到底如何表現「尺度」，而這樣的「尺度」到底如何被超越。此外對於這樣的「尺度」到底與什麼樣的論述有連結的可能性，也將進行檢討。

¹⁷ 對於〈鄭一家〉，楊達當頭棒喝地指出：「鄭家三代始終如一的，就是並無任何正義感以及誠實態度，有的不過是變換方法與手段的奴隸性格」，「如果說皇民化運動只要塑造出這樣的人物便能成功，那可真正地打錯了如意算盤了。沒有誠實感與正義感，那到底是什麼樣的皇民！什麼樣的新體制！這不只是文學上的問題，對政治而言也是重大的課題。我希望主事者在這點上可不要會錯意了。楊達，〈台灣文學問答〉，《台灣文學》2-3，而此處引文引自中島利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文芸評論集》第四卷，頁180。